



后安村北遗址保护碑

□文/片 孙南邮

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山东省文化与旅游厅发布《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名单,地处鲁南的滕州市有九项名列其中。

清阮芸台有言:“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百年考古学可以见证,滕州确是文物大市。在数说滕州百年重要考古发现之时,人们是否还记得在这里曾有过一次令人痛心不已的重要考古损失?

1933年官方首次在滕县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地点在安上村北谷堆顶(今滕州市木石镇)和赵庄村北曹王墓(今滕州市羊庄镇)。这次考古发掘结束后,因日军侵华战火毁掉了发掘资料而无法写出考古报告,成为国内考古研究的一大遗憾!主持此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董作宾,曾称之为“是一幕考古学上之悲惨的史实”!

资料被毁掉了,考古报告永远写不出来了,然而当年《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对这次考古的报道还在,亲历者的记述、日记、书信还在,近些年有关学者对这件事也多有梳理探究,从中我们还能看到这悲惨史实的一幕幕镜头。

1933年3月12日,滕县第二区第八乡安上村农民陈士富之子兄弟三人,在村北俗称“谷堆顶”的高台处挖土填补水毁田地,挖出14件周代青铜器。此时国内考古学方兴,消息传出,见诸报端,学界为之轰动,收购文物者闻讯纷纷至滕出价求购。滕县教育科长魏希鸿深知事关重大,将此事上报省府及教育厅,引起了上层重视,即电令滕县政府“设法购回保存,以免散失”,并特派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同省府候差员张书绅、省会公安局局长刘献庭(滕县人),持省府主席韩复榘的训令,于4月4日抵达滕县。经过查询、协商,省府出资2000元交与发掘者陈氏兄弟,收购其鼎二、鬲四、簋四、盘一、匜一、壶一、罍一,共14件青铜器。购品除壶、罍外,各器都有铭文,有一鼎内还存有全个鱼骨。1944年,滕人生介明编印的《续滕县志》卷五,收入此次出土的青铜器图片及铭文。据续志记载,另有安上遗址出土的一件簋盖为当地人士收藏,上有铭文18字,志书有其图铭。此次安上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当是15件之数。

王献唐在滕县谈妥收购铜器之后,于4月7日到距县城35里的安上遗址作实地考察。安上遗址处于山地之间,路途不畅,须骑驴前行,因“新雨泥泞,道行甚苦,又不惯骑驴,腿膀颇痛”,王先生为此事辛劳可想而知。到达安上遗址后,他通过观察、调查记下:“陶片垒垒满地,鬲足尤多,花纹形式皆商周时物。间以蚌蛤骨骼,前有古井。铜器出土所在,居地之西北。从各方推测:古为高台,台有人居,铜器即其所遗,如古井、瓦片、骨骸、灰土皆其明验绝非葬器也。”

当天晚上,王献唐住宿在家居安上村的乡长陈忠海家中,又得知村东十余里赵庄北有古墓群,当地人称“曹王墓”。翌日,王献唐在一村民的陪同下骑驴翻山越岭赶到曹王墓考察,看到此地有八座汉墓:“墓上有方口,与地平,自口下,即见石室。四面墙壁各有门,门内方形为屋一大间,其深或可见边,或不知其尺寸。屋上皆石板,撑以石柱,所有石板皆为汉代画像,统计大小千余块。屋高七八尺,宽一丈左右。井口有石盖,盖有槽,中有鼻可提。”他看后为“一般民众不知其关系与价值,不加保存,或以之修路,或用之架桥,屋基、墙垣有此项珠宝杂置其间”而惋惜不已,遂有保护起来供各方人士参观考察的设想。

4月10日,王献唐一行三人把此次收购到的十四件青铜器顺利运至济南,公开展览三日后,藏之于省立图书馆。1958年,国家文物局将其中十一件铜器调往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展藏。

王献唐此次滕县七日之行,每天都有详细日记,取名为《滕邑访古记》。这年9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古迹研究会派员到滕县察看这两处遗址。10月9日,中央研究院鉴于滕县多

次发现古物,决定由董作宾和王献唐负责邹、滕、峄三县考古发掘工作。10月14日,董作宾专程到济南同王献唐商谈考古事宜,商定先在滕县动工发掘。王献唐因计划建筑新式图书室不能同往,委派图书馆编藏部主任牟祥农参加。

10月19日董作宾一行抵滕,住宿在黄支田为校长的县城北关区立第一小学。20日董作宾、王湘和牟祥农先行至安上村,22日全体考古人员到达,根据工作需要分为二组。24日一组人员开始发掘谷堆顶,住宿安上村;26日另一组人员开始发掘曹王墓群,住宿赵庄;主持人董作宾骑驴来往于两地之间指导发掘。11月11日,山东大学刘咸教授带领七名学生、一名技术员前来参加考古,至此考古队员已有16人。此次考古各方热情之高,人数之多,被亲历此事的考古专家石璋如称赞为“可与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相媲美,同为考古发掘史上的盛事”。

安上遗址考古发现有陶器、骨器、石器、蚌器、铜器,其中石镰、石刀,有人认为类似于殷墟出土之物,石璋如断定属龙山文化晚期。在陈氏兄弟挖出铜器的原坑,发现了棺椁痕迹及半具人骨等,联想到出土鼎内存有鱼骨,考古人员由此推定此乃墓葬,青铜器当是殉葬之物。在第二十二坑,还发现了殷商时期占卜龟甲。

另一处曹王墓群发掘,是中国首次科学地清理汉画像石墓室,发掘墓扩21个,墓扩建筑构造形式多有不同,其中一扩“深2.2米,东南小室二,互相沟通,隔以棱形小石柱,全扩石柱相同,颇有西洋作风,花纹亦作鱼形”;另一扩“东两面石壁各刻有一星状花纹,形似现在党旗上之白日,惟芒角较少,仅有四个;后部为石洞,洞深邃可一米,其洞底之墓高于墓底一尺,凡此皆为与他墓不同之点。尚有石柱二根,俨然将石洞隔之为两……”墓群考古共获画像石大小62方,五铢钱、陶片等遗物五箱。

当年12月初,考古人员对安上遗址、曹王墓群两处所得古物编号、装箱完毕,运往济南整理。这次滕县考古共持续40余天,参加考古人员16名,雇用工人35名,开坑43个,发掘墓扩21个,得遗物20余箱,采获汉画像石33方。

滕县考古发掘结束后,主持此事的董作宾即投入到殷墟发掘的工作中,可他仍在牵挂着滕县考古报告的编写,于当年12月18日及1934年、1935年三次致函王献谈及此事。直到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爆发,考古报告还没有发表出来,董作宾已整理的报告和发掘的记录资料装入木箱运往长沙,又转运到香港商务印书馆九龙仓库保存。1941年香港沦陷,九龙仓库所存物品全被战火吞没。抗战胜利后,董作宾回忆此事叹息道:“滕县发掘工作,是一幕考古学上之悲惨的史实”“滕县的发掘报告怕是永远写不出来了”!果然如此,后来这两项遗址发掘研究渐渐淡出了考古者的视野。

2017年10月,我骑单车走访曹王墓群遗址和安上遗址。曹王墓群遗址处已是一个普通耕种的小山丘,山上山下未见这里曾经发掘过汉墓群的标记。访曹王墓村老者,有人不知此事,有人虽知曾有此事亦语焉不详。过山口走曹王墓村至安上村最为便捷的山道,有一段已耕种为农田无路可走,只好推车穿田埂绕行。当年的安上村已为前、中、后安三村,遗址处已是平地,种有庄稼、蔬菜,当地人称“宝贝地”。此处有2011年立的“后安村北遗址”市级文物保护碑,背面文字为“后安村北遗址位于滕州市木石镇后安村。时代为周、汉代”,下面是遗址保护范围。

曾经轰动国内学界的安上遗址、曹王墓群考古发掘记录资料没了,谷堆顶平了,像石坑添了,但是出土铜器、汉画像石等物品没有丢,当年的许多文字记述犹在,为了铭记这一悲惨的考古历史事件,有关部门是否该给这两处遗址一个应有的“名份”?

2021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滕州市对羊庄镇前毛堌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央视《探索·发现》播出了《前毛堌汉墓》考古发掘的纪录片。有趣的是这座汉墓建筑也有西洋风格,它是否与曹王墓建筑“西洋作风”有关联?两墓之间或许还有值得对比研究的东西。

【史海钩沉】

山左古泉亦好水

□赵瑞峰

中国古代,江南地区多产茶,因又对煎茶用水甚为讲究,所谓“欲治好茶,先藏好水”(袁枚语)。

唐陆羽《茶经》论好水品级:“山水为上,江次之,井水为下。”这里所说的“山水”即山泉水、泉水。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虽将江水和井水的品级颠倒了一下次序,但也认为烹茶用山水为最佳。唐人张又新在其《煎茶水记》中记故刑部侍郎刘伯刍根据自己的品水经验,推出了一份水榜,入榜的共有七种水。其中扬子江南零水(镇江中泠泉)、无锡惠山泉、苏丘虎丘泉、丹阳观音泉、扬州大明泉等都处于传统江南产茶区。陆羽《煮茶记》中有其所拟水品排行榜,共列出20种水,然而两者完全不涉及北方泉水,岂北方无佳泉名水?当然不是!究其原因,只能说是那时北方不产茶,北人亦少有饮茶者,故北地有无佳泉,也就不在刘伯刍和陆羽的关注视线内。

据唐代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记载:“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根据这个记载,可见自唐代开元之后,北人饮茶源于山东,山东饮茶源出泰山灵岩寺。北方唐时不产茶,所用茶皆自江淮而来。那时“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如用山泉水煎茶固妙,然北地泉水相对较少,又分布不均,完全用泉水根本办不到,就只能就地取材,用泉水,也用江河、井水煎茶。

灵岩寺四面环山,寺周泉脉甚众,著名的如“卓锡泉”“甘露泉”等历史久长,水清馥隽永,不次于江南那些有名佳泉,用来煎茶再好不过。降魔禅师所用煎茶之水想必就是泉水,因为此处泉水所煎之茶甘腴清香,又祛睡醒智,故闻名来饮,转相仿效者多,而渐及于周边地区甚至京邑,也就不奇怪了。

唐代陆羽和刘伯刍推出的那两份水榜,经历唐、宋、元并无更新,以致北方佳泉迟迟无缘榜上,不为天下知。直到明代后期文学家谢肇淛重新推出一份重量级的、网络南北佳泉的泉水排行榜,其中山东济南趵突泉、临淄孝妇泉、青州范公泉三种泉,以其甘冽异常,不仅榜上有名,而且位列三甲,大大地为北方佳泉讨回了公道。但谢公深知无论多么长的水榜,也难以一网打尽大江南北佳泉好水,所以于水榜末又谓“其他难以枚举,但在穷乡遐僻,无人赏鉴耳”,真是达者之言、智者之论。

谢肇淛所制泉水排行榜,虽将山东泉水名列三甲,但为数未免太少,所以到清初,大文学家王士禛出于对家乡的感情,极力向世人推介他所熟知的山东泉水。据其笔记《古夫于亭杂录》之“山东泉水”条载:“……不知大江以北,如吾郡发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尝作《济南水记》,与《洛阳名园记》并传,惜《水记》不存,无以正两子之陋耳。谢在杭品平生所见之水,首济南趵突泉,次以益都孝妇泉(在颜神镇)、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见章丘之百脉泉。右皆吾郡之水,二子何尝梦见。予尝题王秋史(莘)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怜陆鸿渐,跬步限江南。’正此意也。”

王士禛这里所说济南泉水“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也即现在通常所说的济南七十二名泉。自元于钦所撰地方志《齐乘》载金代人所镌《名泉碑》记录济南七十二名泉以来,诸家所记泉名并不尽相同,特别是到了现当代,泉名屡经增删改换,然都合七十二之数,并且趵突泉皆置首位、百脉泉都在其中。格非所作《济南水记》,推想必包含七十二泉在内,如非佚失,颇可作为考察和研究济南泉水古今变迁历史的绝好文献。

乾隆皇帝曾钦定济南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与其并列第一的则是京师玉泉山泉。乾隆《御制文集》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乾隆皇帝从祖父康熙皇帝那里,继承了一套通过称量水之轻重以定水品的方法,但有所不同的是,康熙认为水越重越好,他却持相反看法。京师玉泉山水以银斗较之,仅重一两,比江南素来有名的扬子金山泉、无锡惠山泉、杭州虎跑泉等还轻二厘到六厘不等,等而下之,其他佳泉就更重了,因定玉泉为天下第一。

济南珍珠泉以重一两二厘,和扬子江金山泉差同,而以略重于惠山泉、虎跑泉,只好屈下一等,但亦可证在北方、在山东并非没有足以和江南数一数二的名泉相媲美的佳泉好水。

山东,尤其济南诸泉虽有谢公扬名在前,又得乾隆皇帝赞誉于后,世人多予以认同,然而亦有例外。明代嘉靖年间曾做过奉华县知县、著有《水品》一书的徐献忠却并不看好山东的泉水,不知他根据什么原因,固执地认为山东泉水大多出于沙土中,其气太浊,或者海气太盛,反正总之一句话:不好。徐献忠是否到过山东,品尝过山东的泉水,不得而知。但山东人自古以来心胸豁达大度,不会因其说好说歹,便以为忤而有责难之声。

山东自古多佳泉,别的不讲,只说家乡鲁南,以境内有泰山余脉,从古多泉。这诸多泉虽难与趵突泉媲美,亦未能广为人知并得载入史册,然以其多清冽甘腴,倒让居城之人不惜劳力以远地掬之在桶、饮之在口,享受着它美好的馈赠。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